



引用格式:杨波.《万国公报》与域外游记的传播[J].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2,23(4):75-86.

中图分类号:G210 文献标识码:A

DOI:10.12186/2022.04.010

文章编号:2096-9864(2022)04-0075-12

# 《万国公报》与域外游记的传播

The spread of *The Globe Magazine* and extraterritorial travel notes

杨波

YANG Bo

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,河南 开封 475000

**摘要:**《万国公报》一直将域外游记作为贯彻办刊宗旨的重要文类。域外游记是一种融合游记与政论特质的复合文体,契合教士以报刊传教的文化策略,也符合晚清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时代风尚。《万国公报》刊发的新闻事件和海外见闻,与游记文本构成意义丰赡的互文网络,隐喻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。林乐知《环游地球略述》开创了译述结合、图文并茂的写作范式。《万国公报》不顾朝廷禁令,转载推介郭嵩焘的《使西纪程》,使其逆势流传,成为标志性的舆论事件。《万国公报》是刊载域外游记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、也最系统的近代报刊,对域外游记的兴起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**关键词:**

《万国公报》;  
域外游记;  
《使西纪程》;  
互文;  
传播

[收稿日期]2022-03-01

[基金项目]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18BZW111);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(2017-ZZJH-053)

[作者简介]杨波(1979—),男,河南省沁阳市人,河南大学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近现代文学、报刊史料与中国文学。

“自报章兴,吾国之文体,为之一变。”<sup>[1]</sup>报刊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大局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晚清以降,报刊传入我国并落地生根,承担起表达观点、传播信息和影响舆论的使命,重塑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,催发了传统文学从观念、体裁、主题、结构、语言等一系列吐故纳新的嬗变,最终进入“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”<sup>[2]</sup>。近代文学的变革也是一场传播媒介的变革,在这个复杂的演进过程中,以总结中西、介绍新知为主要特征的域外游记,成为直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文体,尤为引人注目。

域外游记因天然的跨文化特质,留下了中西碰撞交融的时代印记,作者除跨海远行的官员、文人、留学生、教徒外,亦有众多自西徂东的外国传教士或寓华文人。这个数量庞大的作者群体,从亲历其地的视角,以中西杂陈的文字描绘海外新奇诡谲的见闻,摹画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,推介驳杂精奥的科学知识,寄托变革自强的吁求,对我国读者别具一番魔力。域外游记的风行,离不开报刊的推动,它们的联袂登场至关重要。报刊这一被视作“经国之利器”的舶来品,深深嵌入晚清社会的“肌体”之中,并最终形成制度性媒介的新格局,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迁。《万国公报》是晚清持续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报刊,刊登、转载、介绍域外游记是贯穿其始终的一大特色。本文拟以《万国公报》为文本,从报刊媒介的视角观照域外游记的兴起与传播,以期再现晚清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,勾勒报刊媒介与文学文体相伴相生的嬗变轨迹。

## 一、办刊宗旨与文体选择

《万国公报》诞生于1868年9月,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,1907年停刊,承续近40年,其初期名为《中国教会新报》《教会新报》。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初为周刊,虽以颂扬教义、阐释神谕为旨归,但坚持基本事实,声

明“何物生于何方,异事闻于异地,有实情定列报中,无假说刊于斯内”<sup>[3]</sup>,初期多为赠阅。1872年8月31日,《中国教会新报》更名为《教会新报》,从第五卷开始设置《政事》《教事》《中外》《杂事》和《格致》等栏目,甄选文稿,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,宗教话题大幅减少,世俗性、时事性和普及西学的内容渐成主流。编辑部常收到读者诸如“增益见闻使人一观洞悉者,诚莫此为重”<sup>[4]</sup>之类的赞誉来信。1874年9月5日,《教会新报》更名为《万国公报》:“所谓万国者,取中西互市,各国商人云集中原之义;所谓公者,中西交涉事件,凭情论断,不怀私见之义。”<sup>[4]</sup>该刊的视野愈加开阔,内容较为广博,信息量增大,开设有《京报全录》《各国新奇事件》《教会近闻》《西国制造》等栏目,文章并未严格按内容置于栏目之下,而是将长篇集中在刊首,无确定栏目,刊末则栏目固定,多为《各国近闻》《编辑声明》等。栏目作为版面语言,其流变过程显示出其向综合性刊物过渡的痕迹。“通中外之情”与“广见闻”成为《万国公报》的办刊宗旨。沈毓桂曾将其更名缘由解释为:“《新报》篇幅有限,势难遍收,自不得不择人所愿睹而登之,以快众览。”<sup>[5]</sup>可见,其改名的直接原因是读者的阅读期待,根本上是为满足读者汲取新知、广知时事的需求。1883年7月28日,林乐知因教务繁冗,《万国公报》暂时停刊。1889年2月,《万国公报》复刊,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,改为月刊,刊名亦由 *Globe Magazine* (直译为“环球杂志”) 变成 *The Review of Times* (直译为“时代评论”),从这一细节也可看出报纸刊载重心的转移。此后《万国公报》转向谈学论政,旨在敦政本、志异闻、端学术,着力介绍西方政教历史,对比中西、中日社会优劣异同的政论文章成为主流,变革求新的意图愈发彰显。1907年初,林乐知病逝,《万国公报》停刊。三度更名的过程昭示出《万国公报》筚路蓝缕、勉力前行的足迹,背后是林乐知、李提

摩太、艾约瑟等主创人员对办报策略与关注内容的调整与选择,“惟实事求是,不叩虚无而索有,不向寂寞以求音,事之是者录之,事之非者去之”<sup>[6]</sup>。《万国公报》根据时势变化和读者的反馈,不断调整报纸定位和编辑策略,由最初的弘扬教义、联络教众的教会报刊,转型为报道新闻时事、介绍西学新知、评论中外时局的综合性报刊,在此期间,刊载、介绍域外游记是贯穿其始终的重要特色。

1868年9月5日,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创刊号上有一篇报道,介绍1868年5月27日,旧金山总督亨利·亨特利·海特,宴请清廷公使、美国人蒲安臣一行的情况。1868年8月,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、记名海关道志刚,礼部郎中孙家谷等人,在蒲安臣带领下抵达美国,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。志刚的《初使泰西记》概述了宾主对话,张德彝的《再述奇》把笔墨用在奢华的宴会场面上。而这篇报道补二者之阙,兼有新闻通讯的简明和游记文字的生动,将这一盛会呈现在读者眼前。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又刊出后续报道16篇,直至蒲安臣病逝,志刚等人回京复命,展现了“外国通行有年”之“新闻”的魅力。晚清官员的外事活动和域外见闻是报纸关注的重要内容。《万国公报》存续期间,共刊载域外游记40余篇,一半为数万言的长篇连载,亦有短小精致的即兴短篇;既有逐日记事的日记行记,也有按不同主题分类记述的域外见闻。从作者群体来看,有出洋使臣的出使记,如斌椿的《乘槎笔记》、郭嵩焘的《使西纪程》、何如璋的《使东述略》《使东杂咏》;有奉命出国考察人员的考察记,如李圭的《环游地球新录》;有教徒西游的朝觐记,如谢锡恩的《乘槎纪略》《海外闻见略述》;有出国幼童的留学记,如黄景良的《欧游杂录》等。此外,身兼编辑与作者于一身的林乐知也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成《环游地球略述》《三绕地球述略》和《回国纪略》,配图刊印。韦廉臣的《日本

载笔》先在《教会新报》以《东洋载笔》之名连载,后改名《日本载笔》于《万国公报》重刊,并编订成书。此外尚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创作的游览杂记行记,这些作品涵盖了域外游记的所有门类,风格多样,蔚为壮观。

1879年1月4日,《万国公报》刊出《择述〈使东述略〉大义》,强调中国应仿效西方派遣使臣:“泰西各国公使行之既久,而中国何独不然?自开海禁以来,近四十年矣,尔来使臣出洋驻扎各国,事固创始,政亦维新,莫不有沿途笔记以增华人之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者。”<sup>[7]</sup>近代海禁大开,中外联通,开眼看世界是大势所趋,关于各国的新闻报道就是一种西学传播,跨越东西方的作者也承担着传播社会见闻与西学新知的使命。域外游记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,所涉内容关乎政教礼俗、风土人情、中西关系、世界形势和格物致知的主题,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喜听奇闻轶事、乐于学习新知的心理。传教士兼报刊人麦都思说:“现今世界之人,或是住本乡,或是往外国去者,都欢喜听各样新闻,而都要知道各处之人物风俗等,所以有人做地理之书。及曾往游学之人,至回家时,亦有记其所闻见之事,致人人可知外国番邦之好歹,而在其中可取益也。”<sup>[8]</sup>《万国公报》确实扮演了一个“无奇不载,无异不搜”的百科全书式的角色。林乐知第一次从美国返回后,继续主持《万国公报》编务时也承诺:“他日有暇,将途中所历情形略为叙述,登诸公报,为阅者诸君一扩见闻可也。”<sup>[9]</sup>

除传递西学新知外,域外游记还具有借他者之眼反思自我、批判现实的功能。晚清中国,异国风物触动的不再是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,取而代之的是“我不如人”和“时不我待”的焦虑与无奈。这种心系天下、忧国忧民的情怀,使模山范水让位于经世新民,占据了异域言说的核心位置,激发读者、变革图强,关乎时代主题的“大叙述”成为主题。游记文本去掉日期和行程,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政论,游记是政论的外

壳,经世新民才是核心。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,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甲午惨败,面临存亡绝续的境地。《万国公报》鼓励中国近学日本,远效西方,变革自强,“今中国欲变弱为强,先当变旧为新”<sup>[10]</sup>。海外旅行跨越本土的界限去探寻外部世界,空间的转移带来地理形态的骤变和人文环境的反差,给旅行者带来深刻感触和反思,传统观念受到质疑,变革蓄势待发。旅行即孕育着变革,借环球之旅弘扬西方文明、启迪中国,是《万国公报》常用的方式:“环游地球之游,至今岁而积三度,且值中国剥极未复之际,不免目击心伤,及造欧美诸州,覩其去旧从新,诸事多蒸蒸日上,又不禁神游目想,愿我无异生同,井里之良友,速师善法,以兴中邦。”<sup>[11]</sup>林乐知认为,中国应“选派国中强壮循良子弟出洋学习”“无论何人,苟能熟谙本国之情形,然后环球游览,必能得真实之品评,知本国之地位当在何等矣”<sup>[12]</sup>。旅行者置身地球万国,才能知晓本国的真实处境,域外游记成了思考本国前途命运的参照性知识资源。

域外游记兼具取事与传播的特质,已具报告文学的雏形<sup>[13]</sup>,作者之笔犹如记者之笔,文本内部隐含着一个读者和观众的视角,与报刊力求真实、迅捷和全景式地展现世界形势和社会现实的追求不谋而合。作者为名副其实的记者,文本融合了新闻与政论的特质,既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,契合开拓新知、增长见识的基本诉求,也符合促进中国以西为鉴、改革自强的理念,可谓一举多得的绝佳文体。同时,日记行记体无定式,兼容并蓄,文体自由,可随时起讫,便于报纸连载。在《万国公报》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,域外游记作为贯彻和体现报刊宗旨的重要文体,在其引领舆论民意、时代风潮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## 二、新闻报道与域外游记的互文

《万国公报》总体上属于综合性的时事刊

物,在关注中外交涉等国内外事件时采用两种方式:一是提纲挈领的新闻报道,其特点是简洁扼要;二是内容丰富的当事人的日记游记,其特点是真实可感。关注同一事件的新闻文本因观察视角、思考方式和价值评判的差异,形成一种对话式的互文关系,生成以新闻事件为核心的语义场,共同建构起读者了解世界大势的窗口。

1871年3月,《中国教会新报》连载署名“三品銜总理衙门副总办斌椿”的《乘槎笔记》:“《乘槎笔记》一卷记游西国,叙述如绘,分次备登,俾浏览者如卧游焉。”此为《万国公报》刊载域外游记之始。1866年3月至11月,清政府派斌椿一行五人,随英国人赫德赴西方游历考察。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在第125—155期分21次将日记全文连载,着重指出:“此笔记所言法京法宫壮丽无比,今法京乱后为茂草,能无今昔之感?”<sup>[14]</sup>。斌椿一行到访欧洲的第一站是法国,最后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,作为重要的中转站,《乘槎笔记》关于法国的内容较为丰富,编者着意提醒读者注意巴黎的变化,难道因斌椿曾两度到访巴黎?再看《乘槎笔记》之前的新闻报道——《中国崇钦使到法国》:“钦使崇厚之航海也,经狂飙骇浪,恒苦眩晕,以贵介之躯而涉汪洋之海,甚矣!其惫也。兹闻已抵法国之马西倪城,法皇命一有爵大臣恭代法皇款接。”<sup>[15]</sup>要想知道崇厚使法时的巴黎与斌椿笔下的巴黎有什么联系,就必须了解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两件大事:天津教案和普法战争。1870年春夏之际的中国,因天气干旱,加之西人迷拐残害百姓的传言散播,导致6月21日爆发天津教案。彼时欧洲战云密布,7月18日,法国向普鲁士宣战,9月1日,法国大败于色当,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。为尽快了结天津教案,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。1871年1月25日,崇厚一行抵达马赛港,巴黎正陷于战争漩涡。崇厚驻扎波尔多,命张德彝先到巴黎协调接洽事宜。3月18日,巴黎公社革命爆发,张

德彝成了亲历者,后来写成的《三述奇》是难得的目击实录。10月11日,法国总统梯也尔正式接见崇厚一行。

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刊出斌椿日记,是为了配合普法战争的系列报道,斌椿其实承担了一个“过来人”的叙述者角色。《中国教会新报》自第100期刊载《法国新到消息》开始,对定期由海外商船带来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消息进行持续关注,一系列的战事报道贯穿了1871—1872年的《中国教会新报》,相关回顾与评论一直延续至1873年之后,才逐渐淡出读者视线。其中,王韬的文章值得关注:“同治庚午春初,余将自泰西言旋,由英抵法,取道于法京巴黎斯作三日游。往瞻王宫,环历几遍,其宸宫之壮丽,土木之穷奢,物力之富庶,市廛之繁华,诚可谓欧洲之冠矣。乃不意一年间,遂等于咸阳之一炬,物盛而衰,殆其变也,有心者附铜驼于荆棘,阅浩劫于沧桑,不胜唏嘘叹息耳。”<sup>[16]</sup>

王韬曾于1867—1868年随理雅各游历欧洲,后来完成的游记文本《漫游随录》专写巴黎的有《巴黎胜概》《法京古迹》和《法京观剧》。“甲于一时,殆无与侔”<sup>[17]</sup>的巴黎,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普法开战不久,王韬出于职业报刊人的敏感,于1870年11月即着手编写《普法战纪》,于1873年9月完成,部分篇章分别署名“异史氏王韬”“吴郡王紫诠”在《教会新报》发表。因此,斌椿和王韬作为亲身体验过繁华巴黎的两位中国人,他们的言说更具说服力。同时《教会新报》上刊载的《法国皇宫焚毁》《法国都城说》之文中“死者如积”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描述,强化了战争前后的“今昔之感”,巴黎成了见证法国一战而蹶、由盛而衰的重要参照物。《教会新报》详细报道了崇厚使团的行踪,还原了帝国使团磕磕绊绊的行程,也是串联这些事件、新闻与游记文本的逻辑线条,引导读者关注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。

互文性是新闻文本的一个基本属性,不同

的语篇在生成过程中相互交织,其主题在其他同类文本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回应,从而结成链条和网络,深化读者对事件的解读和判断。这一系列的新闻、评论、游记和王韬的《普法战纪》,形成一个互相指涉、意义丰赡的互文网络,共时性与历时性并重的立体的叙事视角,构成文本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,激活了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信息。西方记者笔下的战争实录、中国文人眼中的昔日法国,以及出使官员眼中的巴黎硝烟交叠在一起。新闻关注残酷战争,游记抒写浪漫情怀,评论总结成败得失,共同构筑了巴黎的前世今生:斌椿笔下的巴黎越辉煌,读者对普法之战的后果越触目惊心,“中国之往事如在目前”<sup>[18]</sup>。王韬将普法之战看作“欧洲变局一大关键”<sup>[19]</sup>,观普法之战而知天下之变,法国的败亡在于自恃强盛、轻启衅端。身在列强压迫之下的中国读者,对国破山河在的黍离之悲和兴亡之感,更能感同身受。法国战败,割地赔款,又要应对巴黎公社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,可谓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。这种情形与刚经历过鸦片战争的惨败、平定太平天国叛乱、迎来短暂的“同治中兴”的晚清帝国何其相似,这些互文性文本搭建起一个现实隐喻的舆论场,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。

李鸿章出访欧美是《万国公报》后期关注的又一焦点事件。1896年2月,李鸿章赴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,后赴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国、英国和美国访问,成为轰动一时的外交新闻。西方媒体刊发了很多评论报道,李鸿章随行人员亦有记述,林乐知将相关报道搜集整理,由蔡尔康翻译润色,于1896—1898年,分别以《英轺笔记》《美轺载笔》《德轺日记》等名目,在《万国公报》连载,后由广学会于1899年以《李鸿章历聘欧美记》刊行。这实际上是将记者的新闻报道与随行人员的自述游记相结合的作品,显示了从新闻到游记的文体杂糅与转换轨迹,为新闻与游记的互文提供了另

一个鲜活的例证。新闻报道与游记文本互为补充,游记中秘而不宣、付之阙如的可以看报道,报道中语焉不详、一笔带过的则可参看游记,新闻报道可以增加游记的可信度,扩大影响力,也满足了读者延伸阅读的需求。《万国公报》除报道使臣行踪外,还搜集官方文书一并刊载,如关于外交照会的有《钦使奉使英国敕》《汇集奉使各国旨敕照会》,关于出洋使臣遴选的有《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》《特派近支宗室游历外国事宜疏》,关于外交使节薪俸的有《奏定出使各员俸禄银数》,关于星轺尊容的有《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小像》《醇亲王小像》,甚至也有《崇钦使从者坠楼死》(崇厚随员酒后失足,意外堕亡)、《星使病势续闻》(黎庶昌病重)、《使相被刺纪实》(李鸿章遇刺)这样的秘闻。《万国公报》还对重要游记作者的作品进行了介绍,如1878年第504期刊载李圭的《环游地球新录》。李圭被誉为“诚此一世界之张博望、班定远矣”<sup>[20]</sup>,其赴美参观世博会被渲染成了可与张骞、班固比肩的凿空之旅,以引起读者关注。

官方话语、媒体言论和个人书写的互文网络,其观察视角的差异、叙述辞令的不同,营造出意义复杂的阅读和想象空间,象征变化与动荡不安的世界,是对现实的隐喻。普法之战与中法交涉交织一处的细节,海外使节为国殚精竭虑的努力,引发读者对游记文本的阅读兴趣,“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所闻,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”<sup>[21]</sup>。这种新闻叙事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参照,客观上造成信息密集、生动详实的广告宣传效应。借助报纸一定的发行网络,出洋人物的行踪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,游记对其起到了注解和深化的作用;而读者先睹为快的阅读期待和持续关注的阅读兴趣,也推动了域外游记的传播。

### 三、林乐知《环游地球略述》的范式意义

林乐知于1860年7月来华,直至1907年

在上海去世,其间曾多次回国,留下旅行记述的有三次。1878年3月至11月,林乐知首度回国,写成《环游地球略述》(以下简称《略述》),连载于《万国公报》第551卷至649卷,时间跨度近3年。1898年2月,林乐知再度回国,至1901年11月返回,写有《三绕地球新录》。1906年5月,他最后一次回国,受到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接见,写成《回国记略》。其中,《略述》篇幅最长,近五万言,连载时间最久,内容最丰富,足称《万国公报》西人域外游记之代表:“本馆主自去年游历地球回沪之后,欲将所历之境界,所遇之情形,逐细说明,载登报内,并有画图印出,以为指点之据。……以广阅者之见闻。”<sup>[22]</sup>《略述》是典型的译述合作的结晶,即西人笔述或口述,再由华人修饰改订:“以西书之义,逐句读成华文,华士以笔述之……译后,华士将稿改正,令合于中国文法。”<sup>[23]</sup>《万国公报》的此类文章,林乐知或其他作者署树义、述意、译意、述略、命意、造意、授意、腹稿、口译、口述等,华人编辑署汇编、撰文、属文、遣词、作文、笔述、手志、手书、手录、记言等,作者竖排并列,表示两位合作者同等重要。林乐知与蔡尔康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,作品也最多,他曾对蔡尔康说:“余之舌,子之笔,将如形之与影,水之与气,融美华于一,非貌合而神离也。”<sup>[24]</sup>时人称为“林君之口,蔡君之手”<sup>[25]</sup>,这成为《万国公报》和广学会西学著作的创作范式。这种中西合璧的编创方式说明,新媒介的介入使知识生产机制发生改变,文本叙述范式也随之改变。

中国素以天朝上国自居,天圆地方,独居天下之中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为打破这种盲目自大的观念,《略述》开篇即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球观,指出各国“莫不以本国为天下之中,而视他国则外之也。视己大,待人小,天下通病也”<sup>[26]</sup>。《万国公报》不惜成本,“每张公报内印画图二三幅,以广阅者之见闻”<sup>[22]</sup>。《中国教会新报》早在1869年第2卷便刊出地球图,标

示东西半球和六大洲的轮廓位置。后来张德彝的《航海述奇》(1876年)篇首亦有地球图,与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如出一辙。李圭《环游地球新录》(1878年)附录的地球图略为精细,用虚线标出旅行路线。但从科学性来看,都不及《略述》所配地球图精确。《略述》解读了13种上古神话时代的地球观,如埃及的日神月神说、印度的擎天说、希腊的地形如盒说等,每一幅图像都代表一种看的方式,形象地传达出地理中心主义如何制造处于中心的“自我”和边缘化的“他者”,既直观明了又生趣盎然。图文并茂是《万国公报》的特色和优势,早期以宗教故事插画为主,弘法说教的意味浓厚,后以世界各地风景、建筑和历史人物为主,由插画改为扉画,构建了意蕴丰富的言说空间,给读者营造“虽千万里如同目睹……不啻身临异国”<sup>[27]</sup>的现场感。林乐知呼吁中国不要“株守陈言而不化”<sup>[28]</sup>,应用实践来一扫虚空之习见。林乐知三次回国的路线基本一致,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,旅行时间渐次缩短,第一次210多天,第二次75天,第三次仅40多天,其以亲身经历见证科学进步之速,“世界文明之进步,不啻以余一身揽其全也”<sup>[11]</sup>。要使地球说从地理知识上升为常识,进而接受世界万国的现实,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林乐知的努力就是为了助推这一质变。《略述》不仅记述和还原了作者的环球之旅,也是一次别具心裁的媒介实践,其用崭新的游记形式,降低了读者阅读和接受门槛,具有典范意义。

《略述》的另一重点是阐释去旧从新、变革自强的迫切性。林乐知建议中国近学日本,远效美国。他认为日本这一唇齿相依的近邻与中国有相似之处。《略述》讲述日本伊邪那(男神)和伊邪那美(女神)的开国神话,情节如志怪小说,而后转入现实世界的战争和改革。1853年,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敲开日本大门,1863年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,英国舰队

进攻萨摩藩等一系列战争,加剧了日本的国内矛盾,倒幕运动如火如荼,直至天皇掌权,统一全境。自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,明治维新掀起了全盘西化的近代改革,日本从此走上工业化道路。《略述》用16节的篇幅还原了这一过程,堪称简明的日本明治维新史。《略述》将日本设立西式学校,培养新式人才;重视农矿工商,推进科技制造;修建铁路电厂,发展交通通信;创立武备院船厂,训练陆军水师等一系列改革分门别类地罗列阐释,乃至矿产分布、陆兵人数、财政预算等数据也一一列举,展现了日本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:“弃古昔之旧法,《略述》从今日之新法,则西人辅其法,国家助其资,从此日增而月盛以矣。”<sup>[29]</sup>《略述》也给中国敲响警钟,文中报道日本年满二十岁的青年要注册登记,“故增兵之说良不诬矣”<sup>[30]</sup>。军国主义的苗头已闪现,而中国对日本仍如海客谈瀛洲,茫然无所知。黄遵宪1887年写成《日本国志》,认为日本有“以小生巨,遂霸天下”<sup>[31]</sup>的野心,然而国人却浑然不知。直到甲午战败,《日本国志》才受到重视。林乐知认为,日本的强大在于求学西方,而西方的代表是美国。《略述》还介绍了美国建国立政的过程,重点介绍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。华盛顿的形象在晚清中国传衍甚广,既有提三尺剑开疆拓土的项羽之勇,又兼有天下为公的尧舜之德,乃英雄圣人的合体。林乐知将其拉回凡人的一面,解读《独立宣言》时指出国家运转的关键是有法必依,华盛顿是“君循国政”的典范,文中配有“大美国第一民主,华盛顿之遗像”,使他的形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。

《略述》的叙述者作为一个布道者,以耳闻目睹和道听途说来宣扬上帝的启示,强化学习西方、变革自强的认知。各部分以作者的旅行路线连缀,交代时间、地点和行程,只有这时作者才短暂现身,偶尔逸兴遄飞,寄情山水,也点到为止,因为“途中景物之盛,然皆小焉者也,予当舍其小而论其大”<sup>[32]</sup>。风景退居次席,游

记是外壳,言说国计民生才是文本的核心。以“环游地球”命名的游记,始于李圭1878年7月正式出版的《环游地球新录》。林乐知首次返美在1878年3月至11月,自述“途中目有所见靡不细心访察,实事求是,笔之于书,以增己之见闻。回沪后本拟译华文陆续登印,其题曰《环游地球略述》”<sup>[28]</sup>。由此可知,《略述》与《新录》成书时间大致相同,只是《略述》连载时间略晚。此后,在报刊上陆续出现如《美大臣布兰安环游地球略述》(林乐知、蔡尔康,《万国公报》)、《环球地球杂记》(潘慎文,《格致汇编》)、《环游地球之中国女士》(佚名,《真光报》)、《环游地球》(《集成报》)等一批以“环游地球”命名的游记杂记,成为当时的流行文体。晚清小说中,人物动辄出洋远行、环游世界的情节随处可见,这一主题实际上滥觞于此。

林乐知有意淡化其传教士的身份,自称“进士”或“本馆主”,《略述》文辞雅驯,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,基督教义与儒家文化,耶稣纪年与皇帝年号,以及民主政体与六部官制,字字真实的叙述风格与六朝志怪式的小说笔法交织在一起。《略述》的中文译者为董明甫,后因病由他人代笔,导致了文本连载的中断,这也是导致叙述视角和体例不一致的原因之一。在译述实践中,林乐知提出借用日译词来丰富汉语翻译:“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,其译书则先于中国。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,劳逸之分,亦已悬殊,何乐而不为乎?”<sup>[33]</sup>这一观点与梁启超“日本与我国为同文之国,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,用力甚鲜,而获力甚巨”<sup>[34]</sup>的主张一致。大量新名词的使用,使得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皆面目一新,对读者自然别具吸引力。

从《中国教会新报》开始,域外游记并没有固定的栏目一以贯之。《万国公报》虽为报纸,其形制上更接近传统的书刊,多页装订成册,中后期一度舍弃栏目,只注明文章标题和作者,文章先长后短,重要文章居前,类似文集书稿;只

在1878年6月至8月短暂出现过严格按照栏目分类排版,分《政事》《教事》《各国新闻》《杂说》《〈京报〉选录》,形制较为整饬。1878年11月之后,《万国公报》淡化了栏目编排,《略述》多置于《政事》栏目,也有篇章置于《杂俎》中,其文体定位相对灵活,并不强化文体本身,看重的是其介绍新知、开拓见闻,以及阐发国外政治改革成功经验的复合功能。自《略述》开始,呼吁中国近学日本、远效美国,成为《万国公报》不断重复的主题:“万事皆有自然公共之理,断不能以一国而抗万国,故必当并肩携手,进一境以求一利,不可自以为是,而责人以不公平也。且凡能去旧从新者,斯人尽把臂入林,相视莫逆。日本往事,具有明征。大国堂堂,岂难并置?欲人重我,自自重始。”<sup>[11]</sup>

欲得到各国尊重,必须自强自立,“时势之逼,危乎其危;机会以来,微乎其微”<sup>[35]</sup>,若抓不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时机,只能坐以待毙。这一判断在甲午之后,逐渐被进步知识分子接受。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,成为近代中国维新变革的主题,《略述》此类文本无疑在“日本经验”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#### 四、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的逆势流传

1876年12月2日,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,为马嘉里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,这在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晚清中国,可谓奇耻大辱。出使之初,郭嵩焘便背上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的骂名。1877年1月抵达伦敦后,郭嵩焘按照总理衙门的要求,将途中所作日记约2万多字,整理编订为《使西纪程》,抄送总理衙门。同年4月,同文馆刊印此书。尽管郭嵩焘自言此书不过“略载海道情形,于洋务得失无所发明”<sup>[36]</sup>,但还是因日记对西洋政事多有褒扬,引起朝野痛诋,甚至切齿辱骂。王闿运斥责郭嵩焘“殆已中洋毒,无可采者”<sup>[37]</sup>。李慈铭怒称:“嵩焘之为此言,诚不知是何肺肝!而为之刻者是何心



也!”<sup>[38]</sup>就连开明的薛福成也以为其言之过当,有美化西方之嫌。郭嵩焘受到陵铄诋毁,几不能自存。郭嵩焘及其《使西纪程》的命运沉浮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,揭示出晚清帝国因循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命运。在此过程中,《万国公报》坚定地站到了郭嵩焘一边,全文转载《使西纪程》,着力宣传他的事迹,褒扬其作为中西交流先行者的贡献,为《使西纪程》的逆势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清廷要求使臣上报游记备览的初衷,乃为周知外情,这也使得出使日记兼具公务文书与个人书写的双重性质。总理衙门只规定了写作内容和定期呈送备查的定例,对日记的写作范式没有硬性规定。郭嵩焘自言“日记略陈事理,尤无所避忌”<sup>[39]</sup>。当郭嵩焘认为西洋政教修明不能再以夷狄视之,力图将真正的西方图景和政治理想呈现出来时,域外游记因触犯政治禁忌而成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。同时,由于《使西纪程》以英国为中心视角,“荷兰踞此数百年,近年荷兰衰弱,酋长之居苏门答腊者,抚绥无术,遂至畔乱”<sup>[40]</sup><sup>45</sup>的不当言论招来荷兰公使的抗议。1877年6月,清廷下令将《使西纪程》毁版查禁。但《万国公报》对朝廷禁令置若罔闻,自1877年6月2日起开始刊载,“此稿中国京城业已成书矣,兹照书登报”<sup>[41]</sup>。同时告知读者,《使西纪程》非《万国公报》独家连载,并已译成英文,在香港《西字新报》刊出,“西人见此书中之意,多显郭钦使之卓识也”<sup>[42]</sup>。《万国公报》分9期将《使西纪程》连载完毕,为当时国内郭嵩焘日记公开转载传播的唯一渠道。《万国公报》也考虑到部分内容的敏感性,做了局部的修订,如日记引述班固《匈奴传》谈外交之道,原文为:“来则惩而御之,去则备而守之,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,羈縻不绝,使曲在彼。”《万国公报》改作:“来则以礼接之,畔则以兵威之,而常使曲在彼。”<sup>[40]</sup><sup>91</sup>这样一来,剑拔弩张的气氛就缓和多了。

晚清新闻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官方的默许状态,直至1900年《钦定宪法大纲》颁布,才首次明确了出版言论的相关内容,但无法可依并不意味着可以挑战政府权威。林乐知的《万国公报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,对抗政府禁令,自然因其外国人身份,以及租界保护形成的体制外言路的屏障。《万国公报》有其遵循的舆论底线,对涉及政府官方事务极为敏感:“其中国之官政是非,不便预闻。……中国有中国例,自应与何处辩明曲折是非,定循旧例而行,但教会报未可多事也。”<sup>[43]</sup>后来又重申:“凡中国官场以及审案定罪公允与否,非本报所欲闻,即他处有寄文请录者,亦置之不问。”<sup>[44]</sup>即使转载《京报》,也仅全文照录,从不发表评论。《万国公报》主动介入郭嵩焘事件,非同寻常。在连载《使西纪程》的同时,《万国公报》还借西方媒体为郭嵩焘辩诬澄清,认为《使西纪程》字字真实,言之有据:“凡西人不足之处,皆从实书明,寄与总理衙门,并无一言粉饰。”<sup>[45]</sup>报刊的发行击碎了传统的垂直、纵向且封闭的信息传播渠道,以往那种点对点的邮驿模式被由点到面的新式传播形式取代。张佩伦义愤填膺,但对日记毁而不绝、禁而愈传的情形也无可奈何:“然其书虽毁,而新闻纸接续刊刻,中外传播如故也。”<sup>[46]</sup>李慈铭对《使西纪程》禁而不绝的局面同样无所措手。

为配合郭嵩焘的正面宣传,《万国公报》对他的海外行程做了深入报道,在1877—1879年,相关报道达38篇之多,覆盖了他从领命出使到卸任回国的方方面面,不仅刊载有他奉命出使(《中国钦差领事出洋》)、呈递国书(《中朝钦差面递国书》)、卸任归国(《中钦差告辞回国》)等重大活动,还有他和刘锡鸿期满改派(《钦使改派述闻》《出英副钦使升调德国》)的报道,以及《中国公使出轍游玩》《中国郭钦差参观酒厂》等无关宏旨的私人游历,事无巨细,皆全程跟踪报道,并选登郭嵩焘《上年驻英钦

差谢赈文件》，表扬其身在海外、不忘家国的义胆忠心。《万国公报》除刊发郭嵩焘本人的日记和文章外，同时编发读者来稿和海外新闻，扩大了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，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信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传播方式，增进了传播主体和受众的双向沟通，客观上为郭嵩焘赢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。报刊重塑了晚清帝国的信息传播网络和社会权力运行机制，成为政治生态的晴雨表，甚至影响到郭嵩焘本人的政治命运。这些文字或摘自西方媒体，或出自《万国公报》编者之手，抑或来自海外的投稿；有短讯，有长篇评论，还有英国诗人傅澧南称颂郭嵩焘“蹇蹇王臣，爱国忠君，愿公怀抱，如日照临，炳耀六合，海宇清平”的赞歌<sup>[47]</sup>。在郭嵩焘陷入舆论抨击、几乎无处容身之时，《万国公报》给予了他不遗余力的支持：“郭公充使臣之职，往来英法两国，为星使之弁冕，即后任之楷模……郭公才猷素裕，经济素优，拜星轺之命，出使于国政不一、人物不同、风俗各异、言语迥殊之区，其迹似易，而道高则谤起，德重则毁来，覬闵既多，此又易而难者……不见妒于西国之执政大臣，不貶讥于西国之文人教士，而中国或有人非之谮之，是诚何心！”<sup>[48]</sup>

这些文字显然强烈谴责郭嵩焘事件背后的阴谋论者和构陷者，认为如此才识卓著、勇于任事之人竟然遭受不白之冤，实在太过荒谬。当然，《万国公报》对郭嵩焘毫无保留的赞美，也有林乐知和郭嵩焘二人个人私谊的原因。林乐知和郭嵩焘熟识已久，在郭嵩焘出国之前，林乐知曾赠其《中西关系论略》一书<sup>[40]</sup><sup>353</sup>；归国后，郭嵩焘途经上海，曾专程参观林乐知创办的格致书院和徐家汇天主教堂，林乐知又转赠诗人傅澧南的《赠别》诗<sup>[40]</sup><sup>985</sup>。《万国公报》这些有关郭嵩焘的报道和评论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和选择，全方位展示了他的海外生活与外交活动，形成了舆论合力，成功塑造了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开明广识、忍辱负重、足堪大任的外交官形

象，《使西纪程》广为流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这其实是一次由《万国公报》主导的危机攻关，《万国公报》关于郭嵩焘的报道和评价，很难说公允客观，如对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之间交恶，后被提前征调回国之事就绝口不提。这些其实是西方人站在维护西方文化立场上的价值判断，客观上为郭嵩焘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。《万国公报》扉页上的“this magazine circulate among the mandarine and leading merchant throughout the empire”，明确了目标读者的定位——上层官员和士绅，这些报道为郭嵩焘争取到了更多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支持和关注。二十多年之后，林乐知为《李鸿章历聘欧美记》作序时重提旧事：“中国素有鄙薄外人之意，不屑简使出洋。迨至无奈而修通好之仪，爰有奉使诸公，目击外洋全盛之谟，不能不默识于心，或更笔诸简册……乃中国于其所知之事，笑为海外奇谈；于其所著之书，竟至劈其板而焚其纸，是避明而就暗也，自愚以愚民也。京中之满汉大僚，尚夜睡而闭其目也，华事尚可为乎！”<sup>[49]</sup>

林乐知为郭嵩焘鸣不平，痛斥晚清官员的昏聩无知和保守排外，当年的妄自尊大、抱残守旧为后来的中国败局埋下了祸根。他还断言李鸿章访问欧美各国期间，一定也有很多文字因郭嵩焘的前车之鉴不敢公开发表。郭嵩焘经此打击，把相关文字一切蠲弃，不再刊录。《使西纪程》被禁之后，后来的出洋使臣对记述文字增删修改，如履薄冰，慎之又慎，大大削弱了文本的个性色彩，为出使日记这一文体留下诸多遗憾。

与《万国公报》不同，同时期的《申报》对郭嵩焘的海外之行也有报道，但失之严谨，近于戏谑，因画像一事的报道被郭嵩焘追究责任<sup>[50]</sup>，造成轰动一时的“名誉纠纷案”。郭嵩焘得益于《万国公报》的支持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肯定，也解构了帝国的权威和合法性。《使西纪程》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的进步，现在看来当然毋庸置疑，但在昔日众人昏昏的时代，没有

几人敢说公道话。后来,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大臣薛福成,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时,特意将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恭呈御览。郭嵩焘感激不已,这已是十二年后的事了。在郭嵩焘蒙耻受辱、无可存身之时,《万国公报》站到了与保守派对立的一面,使《使西纪程》有幸毁而难灭、禁而不绝,为域外游记的兴起和流传起到了示范作用。

## 五、结语

1876年前后,《万国公报》依靠民信局、洋行外轮逐渐拓宽了发行网络,打破了早期只能依靠教众内部传播的局限,“已传遍中华十八省各府地方,再各西国大口岸皆有买者,东洋各埠行销不少”<sup>[51]</sup>,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发行和销售网络。1883年《万国公报》第一次停刊前,发行量大致每月2000份左右,最多可达每年10000份;1889年复刊后,最初每月维持在1000份左右,后经广学会推介,发行量大增,每年可售出30000多份,其动辄数万份的销量和相对完整的发行网络是一般著作无法比拟的。以李圭的《环游地球新录》为例,此书由李鸿章作序,海关总署出资刊印3000册,并安排各地税务司代售,但大部分读者阅读的途径仍是报纸,如孙宝瑄在《万国公报》上读到《环游地球新录》,称赞“鳞瑜璨瑳,如履其境,盖万国宝物所萃焉”<sup>[52]</sup>。《万国公报》在当时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可见一斑。

读者对异国他乡的梦想和认知需求、对改变现实和向往更好生活的愿景,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推动力。域外游记也因风借力,成为关注变革、反映社会的时代文体,成为一面他者之镜,映照出创新与传统、进步与保守、抒情与纪实、个人与时代互相影响的复杂过程。“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,晚清公共领域的扩张,域外游记开始进入大众视野,并与现代报刊等大众传媒相结合。”<sup>[53]</sup>这种报刊与文体相伴相生

的媒介生态应是域外游记研究关注的重点,唯有如此,才能揭示文学、媒介与时代的演进与嬗替规律。报刊的媒介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型政治逻辑,报人、报刊与官方体系之间产生裂痕,“当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知识分子眼中越来越弱化甚至消失时,报刊政论就倾向批判而不是建言”<sup>[54]</sup>。域外游记,不论是出使官员的记述,还是传教士的说教,都与当时现实形成鲜明反差。郭嵩焘的《使西纪程》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“忠诚的反对”,正是阿伦特所讲的“良心反抗”<sup>[55]</sup>,在禁而不绝的悖论中逐渐深入人心。《万国公报》并非最早刊载域外游记的近代报刊,但却是刊载域外游记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、也最系统的报刊。域外游记与报刊的结合,真正将文字、传播和观念融为一体,既有思想启蒙、传递新知的合法性,又暗含着建构新世界、颠覆旧秩序的力量,共同参与到近代中国思想启蒙、知识更新和文学吐故纳新的大潮中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中国各报存佚表[J]. 清议报,第100册,1901.
- [2] 关爱和. 晚清: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的开启[J]. 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0(3):132.
- [3] 本书院主人特启[J]. 中国教会新报,1869(45).
- [4] 上林华书院主人书[J]. 中国教会新报,1869(45).
- [5] 沈毓桂. 辞万国公报主笔启[J]. 万国公报,1894(61).
- [6] 林乐知. 本馆主人自叙:再录教会报大旨五十八说[J]. 万国公报,1875(322).
- [7] 择述《使东述略》大义[J]. 万国公报,1879(521).
- [8] 咬留吧总论第一回[J].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,1823(1):1.
- [9] 林乐知. 接办公报启[J]. 万国公报,1878(560).
- [10] 林乐知. 文学兴国策序[J]. 万国公报,1896

- (88).
- [11] 林乐知. 三绕地球新录[J]. 万国公报, 1901(155).
- [12] 林乐知, 任保罗. 美大臣布兰安环游地球略述[J]. 万国公报, 1907(127).
- [13] 丁晓原. 论发生期的中国报告文学[J]. 吴中学刊, 1997(4): 31.
- [14] 斌椿. 乘槎笔记[J]. 中国教会新报, 1871(144).
- [15] 中国崇钦使到法国[J]. 中国教会新报, 1871(144).
- [16] 法官记[J]. 中国教会新报, 1871(147).
- [17] 王韬. 巴黎胜概[M]//王韬. 漫游随录.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4: 59.
- [18] 布法和议成[J]. 教会新报, 1871(131).
- [19] 王韬. 普法战纪[M]//光绪乙未重镌弢园王氏藏本.
- [20] 沈毓桂. 李小池刺史思痛记金陵兵事汇要记[J]. 万国公报, 1889(4).
- [21] 近事要务衍义[J]. 万国公报, 1883(738).
- [22] 本馆第十二年接办新式万国公报告白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45).
- [23] 傅兰雅.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[M]//张静庐.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7: 18.
- [24] 蔡尔康. 送林乐知先生暂归美序[J]. 万国公报, 1898(109).
- [25] 龚心铭. 中东大战本末初编叙[J]. 万国公报, 1897(101).
- [26] 林乐知. 续环游地球略述并图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52).
- [27] 林乐知.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[J]. 万国公报, 1903(176).
- [28] 林乐知. 环游地球略述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51).
- [29] 林乐知. 续环游地球略述论工商之事[J]. 万国公报, 1880(587).
- [30] 林乐知. 续环游地球略述论日本陆路兵事[J]. 万国公报, 1880(588).
- [31] 黄遵宪. 日本杂事诗: 广注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8: 571.
- [32] 林乐知. 续环游地球略述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65).
- [33] 林乐知, 范祎. 新名词之辨惑[J]. 万国公报, 1904(184).
- [34] 梁启超. 饮冰室合集: 文集一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9: 76.
- [35] 黄遵宪. 朝鲜策略[M]//黄遵宪. 黄遵宪集.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3: 403.
- [36] 郭嵩焘. 致李傅相[M]//郭嵩焘. 郭嵩焘诗文集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4: 243.
- [37] 王闾运. 湘绮楼日记: 第1卷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7: 569.
- [38] 李慈铭. 越缦堂日记[M]. 扬州: 广陵书社, 2004: 7453.
- [39] 郭嵩焘. 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[M]//郭嵩焘. 郭嵩焘奏稿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3: 388.
- [40] 郭嵩焘. 伦敦与巴黎日记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4.
- [41] 使西纪程[J]. 万国公报, 1877(441).
- [42] 使西纪程已翻西字[J]. 万国公报, 1878(474).
- [43] 本书院覆信[J]. 教会新报, 1873(225).
- [44] 本报现更名曰万国公报[J]. 教会新报, 1874(295).
- [45] 大英歌颂中国公使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27).
- [46] 杨锡贵. 郭嵩焘《使西纪程》毁版述评[J]. 船山学刊, 2013(4): 65.
- [47] 译英人傅澧兰赠别郭瀛仙星使诗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27).
- [48] 论使臣不辱君命[J]. 万国公报, 1879(537).
- [49] 林乐知, 蔡尔康. 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叙[J]. 万国公报, 1899(126).
- [50] 上海图书馆. 近代中文第一报《申报》[M]. 北京: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3: 88-91.
- [51] 万国公报告白[J]. 万国公报, 1875(348).
- [52] 孙宝瑄. 忘山庐日记: 上册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: 99.
- [53] 杨汤琛.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21: 191.
- [54] 哈贝马斯.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[M]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1999: 221.
- [55] 刘剑涛. 阿伦特的良心观: 良心与自身关系[J]. 现代哲学, 2022(2): 78.